

Sinologia Hispanica, China Studies Review,
14, 1 (2022), pp. 1-8

Received: May 2022
Accepted: June 2022

The Birth of Sinology and the Contributions of Spain

El nacimiento de la sinología y las aportaciones de España

汉学的诞生和西班牙的贡献

阎纯德

yanliyang999@163.com

Yan Chunde*

School of Humanitie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100083

Abstract: The term “Sinology” origins in the late 17th century and early 18th century. Since then, countless missionaries merged into China without prejudice, which not only brought “Eastward Spread of Western learning to China”, but also created “Westward Spread of Chinese culture to the world”,

* 阎纯德，历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中文系主任、教授。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创办《中国文化研究》，现任《汉学研究》《女作家学刊》主编、欧洲龙吟诗社名誉社长、法华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华炎黄文化协会理事。曾赴法国巴黎第三大学、马赛第一大学、国立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波尔多第三大学和意大利博伦亚大学及米兰大学讲学。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文化、20世纪中国文学和汉学研究。

translating Chinese cultural classics to the west, which became the key to the birth of Sinology. Spain is a pioneering country with a thriving sinology study in Europe, and its contribution has greatly influenced the Western imagination of China and the birth of generations of sinologists. Due to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cultural contexts, thinking patterns, people will have different conclusions and speak different truths about the culture. Sinology, which connects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scholars to fulfill the mission of academic exploration in China studies. On the occasion of the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3-4, May, 2022) on China Studies: East West contact and dialogue organized by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of León University, Professor Yan Chunde presented his keynote speech entitled "The Birth of Sinology and the Contributions of Spain", aiming to summarize the history of sinology studies throug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 of time and present Spanish sinologists' contributions to the readers, concluding human beings need a variety of cultures to be inclusive to learn from each other's strengths, to make up for their own weaknesses, and finally to reach the cultural realm of "achieving unified goals of self and others-thus the world can be harmonized".

Key Words: Sinology; Spain; Chinese Classics; culture.

Resumen: El término "sinología" tiene su origen a finales del siglo XVII y principios del siglo XVIII. Desde entonces, innumerables misioneros se fusionaron en China sin prejuicios, lo que no solo trajo "Difusión hacia el este del aprendizaje occidental hacia China", sino que también creó la "Difusión hacia el oeste de la cultura china al mundo", traduciendo los clásicos culturales chinos al oeste, lo que se convirtió en la clave del nacimiento de la sinología. España es un país pionero con un próspero estudio de sinología en Europa, y su contribución ha influido mucho en la imaginación occidental de China y el nacimiento de generaciones de sinólogos. Debido a las diferencias culturales, precedentes, diferentes patrones de pensamiento y contextos culturales, las personas llegarán a diferentes conclusiones y hablarán de diferentes realidades sobre la cultura. La Sinología conecta a académicos chinos e internacionales para cumplir la misión de exploración académica en los estudios de China. Con motivo del III Congreso Internacional (3-4 de mayo de 2022) sobre Estudios de China: contacto y diálogo entre Oriente y Occidente organizado por el Instituto Confucio de la Universidad de León, el profesor Yan Chunde presentó su discurso de apertura titulado "El nacimiento de la sinología y las Aportaciones de España", con el objetivo de resumir la historia de los estudios de sinología a través de la traducción de los clásicos chinos en diferentes épocas históricas y presentar a los lectores las aportaciones de los sinólogos españoles, concluyendo que el ser humano necesita la variedad cultural para ser inclusivos, para aprender de las fortalezas de los demás, para compensar sus propias debilidades y, finalmente, para alcanzar el criterio cultural de "lograr objetivos unificados de uno mismo con los demás, de modo que el mundo pueda armonizarse".

Palabras clave: Sinología; España; clásicos chinos; cultura.

摘要: “汉学”一词起源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自那时起，传教士开始融入中国，积极参与“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翻译中国文化经典，为汉学的诞生创造契机。西班牙是欧洲汉学研究蓬勃发展的先驱国家，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和早起汉学家的产生。由于文化背景和文化语境的差异、思维方向和方式的不同，人们对文化的看法会有不同的结论，说出不同的真理，汉学研究联系中外学者，承载着学术探索的历史使命。在第三届“东西方接触与对话”：中国学国际研讨会召开之际（2022年5月3-4日，西班牙莱昂），北京语言大学阎纯德教授发表主旨发言，题为《汉学的诞生西班牙的贡献》，通过回顾总结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文化典籍外译研究及西班牙汉学家的历史贡献，指出人类的进步需要多种文化的兼容并包，取彼之长，补己之短，最后达至“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境界。

[关键词] 汉学；西班牙；中华典籍；文化

一、汉学的产生

Sinology（汉学）从哪里来？何时，因何而生？我曾经怀疑它可能是从法文Sinologie演化而来，因为法国汉学的历史稍早于英国，也曾怀疑它可能最早产生于葡萄牙、西班牙或意大利，因为它们的语言文字极其相近，汉学的历史也早于法国。“Sinology”在这几个国家的文字中，基本都很相似，词根都一样，是“Sin”，意思是“秦”，所指的是中国，源自拉丁语。这个问题我琢磨了好几年，也征询过几位欧洲汉学家，使我对Sinology的来源基本清楚了。Sinology一词源自拉丁词语“Sina”（China, 中国）和希腊词语“logia”（意思是科学，也含有考古学或哲学的部分意思），前者所示“中国”，后者所示“科学”或“研究”，两者组合在一起，就是关于“中国科学、文化研究”。

Sinology一词，最早应该出现在“后利玛窦时期”某个传教士的智慧，大概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从那时起，传教士就将对中国文化的译介和研究称为Sinology（汉学），研究者称为Sinologist（汉学家）。20世纪始自七八十年代，中国学者对研究中国文化的外国学者的这种学问有多种叫法，为此，我曾给欧洲的多位汉学家写信或当面征询他们的看法。高利克回信说：“我认为Sinology(汉学) or Sinologist（汉学家）是用以指称我们所从事的事业的最恰当的词语。”汪德迈和施舟人虽然并没有反对人家把“Sinology”称作“中国学”（China Studies），但他们都最认可的是“汉学”和“汉学家”。

说到汉学，所有的外国汉学家并没有将其视为“汉族”之学，或是“汉代”的学问——尽管汉代、清代均有“汉学”之名，但汉代的“汉学”、清代的“乾嘉汉学”和宋代的“宋学”一样，皆指“国学”。“Sinology”完全是借用“汉学”之名，所代表的就是中国文化。现在国内对“汉学”的称谓甚多，除了汉学，还有国际汉学、世界汉学、中国学、国际中国学、国外汉学、海外汉学、域外汉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中国研究，等等。

我认为，“汉学”从四百年前发展到21世纪，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问世的“中国学”，其名字虽然不同，但实质上它们已经互相包容、融为一体了；它们是“异名共体”，表述相同的内涵。美国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虽然最早打起“中国学”的旗帜，但美国至今还是以太多太多的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的学者依然称其学问为“汉学”，喜欢别人叫自己“汉学家”！日本出现“中国学”早于美国，但是，日本的“汉学”从未销声匿迹；“汉学”和“中国学”在日本学界是分开说的：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是“汉学”，研究中国现当代政治和经济的是“中国学”。

那么，汉学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呢？尽管众说纷纭，但一般都将其分为“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和“专业汉学”。尤其1814年12月11日，法国法兰西学院26岁的雷慕沙，开设了一次“汉文与鞑靼文、满文语言文学讲座”，这汉学的第一课，便为“汉学”作为一种学术和文化揭开了“专业汉学”的序幕，影响了其他欧洲国家纷纷效仿，从此启开了西方汉学的新时代。法国的汉学家层出不穷，众多的汉学家为中法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后来，戴密微在论述法国汉学历史时曾说：汉学的先驱是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但是，汉学作为学术研究和一种文化形态，举大旗的则是法国人。

二、中西交流的历史背景

人类大约在公元前三四千年后才开始互相寻找。

“寻找”就是交流。公元前5世纪，腊人就记述了天山南北麓居民的情况，并以地中海、黑海为界，最早分出欧罗巴和亚细亚。希腊人克泰夏斯在公元前4世纪就对中国人有所记述；公元前334年至324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喜马拉雅把他挡在了印度，最终没有到达中国。到了罗马时代，情况发生了变化，这在东西方交流史上意义重大，因为罗马时代的文献里开始出现中国地理、物产、居民的记载。纪元前后，中国人被称为赛里斯（Seris），中国叫作赛里加（Serice）；另一种叫法，称中国为秦（Sin, Thin），中国人被称为秦尼（Sinai, Thinai）。西方人的这种称呼，均源于秦始皇时代。希腊罗马文化扩大于西欧，这时出现了“东方”（Orient）这一概念，中国成为欧罗巴之外的特殊世界。这时，“东方”始见于罗马时代著述家的笔下，在《法国大百科全书》《小百科全书》及《世界历史大事表》里，均能找到这样的记载：公元170年，罗马帝国的特使马克·奥尔雷（Mark Aurle）到过中国。这大概是东西方最早的交往记录。

从古罗马时代开始，就有冒险家、旅行家和商人东来，他们爬山涉水，漂洋过海，寻找神秘的东方，实际上就是寻找传说中的中国。无论是先秦两汉，或是隋唐，幅员辽阔，山川美丽，繁荣富庶，善良好客，就是留在他们“书信”“日记”和“游记”里的中国形象。这些历史“文献”，较早的有公元851年描述大唐帝国繁荣的阿拉伯帝国（大食国）旅行家苏莱曼的《中国印度见闻录》（一译《苏莱曼东游记》）、1254年方济各会修道士威廉·吕布吕基斯（又名吕布鲁克；1215-1219）的《远东游记》、意大利雅各·德安克纳的《光明城》；但是，这类著作，最著名且影响至今的当属《马可·波罗纪行》（《东方见闻录》）。马可·波罗于1275年随父亲和叔父来到中国，觐见过元世祖忽必烈，1295年回国后出版了这本书，它以美丽的语言和无穷的魅力翔实地记述了中国元朝的财富、人口、政治、物产、文化、社会与生活，第一次向西方细腻地展示了“唯一的文明国家”的方方面面。这些记录中国所见所闻所思的文字，有学者将其称为“旅游汉学”。其实，这些文字虽有一些“汉学”价值，但也只能是“旅游文学”，算不上真正的“汉学”，因为它们缺少对于中国文化经典的传播与研究。

在人类互相寻找中，中国人并不落后。公元前139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先后两次出使中亚各国，直达地中海东岸，千辛万苦，历时十多年，开创了贯通了亚欧非的陆路“丝绸之路”，通过交往，为其他民族了解中国开创了先河。

三、西班牙早期汉学研究的贡献

法国戴密微（Paul Demieville, 1894-1979）在论述法国汉学历史时曾说“汉学的先驱是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我想，这是因为这三个国家早期的传教士，在译介和传播中国经典文化上做出了贡献。西班牙之于汉学诞生的贡献，可以从“中西关系史、传教史、殖民史”来考察。“大航海”的思想源

头在西班牙。明末清初，1453年至1689年，是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由此揭开了欧洲历史发展的序幕，还推动了宗教改革。

这期间，由于受马可·波罗《东方见闻录》的影响，西班牙国王产生了开疆拓土的强烈愿望，决心到“东方”“殖民”，寻找财富。意大利人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和葡萄牙人麦哲伦（Fernando de Magallanes, 1480-1521），这两位航海家和探险家，先后受雇于西班牙王室，开始大航海。1492年8月3日，相信大地是球形的哥伦布，带着国王给印度君主和中国皇帝的国书，从欧洲启航向西航行，寻找印度和中国。他率领三艘帆船从西班牙巴罗斯港向西航行，虽然无意中发现了美洲大陆，但到死都认为他发现的新大陆是“印度”。1519年8月10日，麦哲伦率领五条船出发，历时三年，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首次环球航行，1521年4月27日，麦哲伦的船队到达菲律宾的马索毕岛，实现了环绕地球的理想，他成为第一个拥抱地球的人。但是，此次航海代价巨大，出发时二百多名船员，返回时只剩下18人，他也在与菲律宾土著居民的战斗中献出了生命。大航海是“殖民”航海，也是“科学”航海，新大陆的发现，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使欧洲成为世界的中心。1564年4月，西班牙人又到菲律宾，在宿务岛建立了第一个亚洲据点，并从那里建立中国-菲律宾-墨西哥-西班牙“殖民”和“贸易”航线。

就在这一时期，垂涎于中国这块辽阔大地的西班牙王朝，企图以传教士入华传教的契机，达到“殖民”的目的。1540年，最早来华的西班牙耶稣会士是罗耀拉（Ignacio de Loyola, 1491-1556）、圣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Javier, 1506-1552）等人；接着又有意大利的范礼安（Alexandre Valigani, 1543-1607）、罗明坚（Michel Ruggieri, 1543-1607）等传教士来华。1583年，即明朝万历十一年，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神甫才到中国，从此耶稣会士在中国的宗教文化活动无论是对于西方或是对于东方，都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因为大航海，西班牙成为最早的“日不落”。但是，不管是在菲律宾、墨西哥，或中国，这三处“辉煌”都和早期“汉学”有关。西班牙多明我会传教士高母羡（Juan Cobo, 1546-1592），16世纪在马尼拉对华人传教多年，除了著有汉文《天主教教义》《无极天主教真传实录》和《中国指南》《中文字典》《中国语言的艺术》等，还将论流行于当地，辑有孔、孟、荀、老、庄及朱熹等人的名言隽语的《明心宝鉴》译成西文，成为译成欧洲文字的首部中国书籍。另一位传教士马丁·德·拉达（Martín de Rada, 1533-1578），他的《中文语法与词汇》（Arte y vocabulario de la lengua china）是西方第一部中国语言文字的著述；1575年6月12日拉达从菲律宾入华，回国时带回百余部中国典籍及访华见闻，写成《中国纪行》，是那时西方第二部论述中国的早期汉学著作。

最早入华的著名耶稣会士沙勿略（Francisco Javier, 1506-1552）和罗耀拉（Ignacio de Loyola, 1491-1556）等多位传教士，他们在日本了解中国之后，再将关于中国的信息传回西班牙，主张以“适应政策”传教，“派

往东方的传教士应具备一定的学识，得先学习该国语言与文化，用当地语言传教。”他们虽然肩负着“殖民”和“传教”的旨意，但和众多的传教士一样，以“真善美圣”的情怀融入中国社会，积极参与“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为汉学的诞生创造契机。西班牙传教士，从不同空间和时间，围绕东方这个文明古国，他们的一切努力和关于中国文化和知识的积累，最终都集于门多萨的手下，参与了营造“汉学”的诞生。

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 1545-1618），虽然没有来过中国，但他为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或者说为汉学的诞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门多萨编著了一部于1588年出版的《中华大帝国史》，这部大书被誉为汉学的第一部著作，因为它比1678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子》整整早了90年。这部“大帝国史”对中国的政治、历史、地理、文字、教育、科学、军事、矿产资源、物产、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等第一次做了百科全书式的详细介绍，学术价值高，先后以七种文字印行，风靡欧洲。这部大书的编著出版，是门多萨受教皇之重托，根据当时所能收集到的关于中国的记载及传教士们的文件、书信、日记、报告等多年积累的文献，以及已经翻译成欧洲各种文字的中国书籍，经过细心研究、辛苦整理，才写出轰动当时整个欧洲的汉学巨著。这部著作和《中国哲学家孔子》的出版发行，极大地影响了西方人对中国形象的想象和一代代汉学家的诞生。

四、传教士与中国典籍传播

数不清的传教士来到中国，把中国文化经典译介到西方，成为“汉学”（SINOLOGY）诞生的关键。传教士除了关注中国社会及民俗，更是在学好汉语之后，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中国文化经典上，例如对“四书”（《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五经”（《易经》《尚书》《诗经》《春秋》《礼记》）的译介、研究和“传播”。“四书五经”重“道德”和“思想”，《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人要学习、省察及领悟，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和思想境界。只有“闻道”，才能率性而“从心所欲”行正途，顺天命而行才能“万物与我为一”，使自己和天地万物融为一体；《中庸》还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朱熹这样解释：“盖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矣。”《大学》开篇即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正是为官之道，“正心”、“修身”，“亲民”，也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论语》《孟子》，其旨在于“克己复礼”、“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政以德”等高尚的德行。“四书五经”的美好精神，甚为传教士们所折服，这一切，都成为日后“汉学”宝贵的生命土壤。

传教士的耕耘对于汉学的诞生是决定性的，但他们是如何实现的？应该说，与他们首先掌握“汉语”密不可分。如果没有“汉语”习得，很难会发生文化上的深入交流与传播，“汉学”这个混血的文化产儿，也不会诞生。这就是说，传教士催生了“汉学”。梁启超说：“八股使得学界贫血，至万

历利玛窦等西洋人来，学术界风气才为之一新。”（《中国学术三百年思想史》）这证明传教士对中国文化有影响。

不少传教士是抱着真善美圣来到中国的，尽管他们的初心也有“殖民”。1579年7月罗明坚到达澳门，开始学习中文，发现“儒释道”精神其实与基督教的精神有不少相似之处，“知儒教之不可攻，则附会六经中上帝之说，以合于天主，而特攻释氏以求胜然。”（《钦定四库全书》）罗明坚实为开“儒耶合汇”先河之师，利玛窦与他的观点一致，主张以彼此互相尊重，以儒家经典中的理性精神进行对话。但是，反对的声音也很大，不仅是葡萄牙的范礼安，西班牙的桑切斯（Alonso Sánchez）甚至说：“我和罗明坚的意见完全相反，我以为劝化中国，只有一个好办法，就是借重武力！”罗明坚和利玛窦抱着“弃佛依儒传教”融入中国社会，赢得信赖和支持，开始研究中国文化，为东西文化交流做出了伟大贡献。

在中国传教期间，罗明坚著有《圣教实录》；1590年他译完西班牙文四书（Los Cuatro Libros）；在1591-1593年，用拉丁文翻译《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手稿现藏于意大利国家图书馆（编号为FG [3314] 1185），是“已知最早的儒家经典欧洲语言译本，开东学西渐之先河”。“1593年，耶稣会士波塞维诺出版的《书目选编》收录了罗明坚《大学》写本译文的前四句，这是西方首次出版中国经典内容。”这证明罗明坚才是儒学西译的真正奠基人。

利玛窦著译了《几何原理》（与徐光启合译）《天学实义》《关于耶稣会进入中国》及《中国札记》等。他的《中国札记》和大量的日记、信札和报告保留了明末中国社会的第一手史料，成为汉学形成期具有奠基价值的著作，使这位思想家和观察家可以当仁不让地视为西方汉学的鼻祖之一。意大利卫匡国、殷铎泽、熊三拔、艾儒略，比利时南怀仁、鲁日满，德国的汤若望、基歇尔，法国的龙华民、金尼阁、邓玉函，葡萄牙罗如望，数百名传教士身后所留下的关于中国及其文化的各种著作和文字记录，都成为汉学成长的沃土。由于宣教思想和策略不同，导致教会矛盾，罗明坚被耶稣会召回罗马，译介儒家典籍，则由利玛窦及后来的柏应理与殷铎泽、恩理格、郭纳爵合作完成，这部影响深远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于1678年以拉丁文出版后被译成法、英、意、西、俄、德等多种文字，使中国文化得以广泛传播，这个标志性的“事件”，便是Sinology（汉学）诞生的标志。

自明末清初，直至20世纪40年代，一批又一批传教士东来，他们在中国各地“传教”，其实也是考察中国，了解、学习和研究中国文化，然后著书立说，“四书五经”及唐宋、元明清各个时代重要的人文学术著作和唐诗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均有数不清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译传播到世界各地。之后，20世纪50年代，汉学的中国之路虽有过坎坷，但并未止步，其命运依然追随着中国的历史跋涉着；尤其在“文革”之后，一百多个国家年轻的学者来中国学习汉语和文化，不久他们成了新一代卓有成就的汉学家，他们有的译介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的研究中国的语言，有的钟情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从“五四”时期的鲁迅、胡适、郭沫若、郁达夫、闻一多、徐志摩、

梁实秋、谢冰莹、张爱玲，到当代的李瑛、谌容、张洁、舒婷、王安忆、张抗抗、余华、莫言等作家的作品，都是汉学家们译介和研究的对象；与此同时，汉学家们也不断以新的视阈译介和传播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

五、结语

“Sinology”之根是中国文化，或者说它与中国文化同根同源，因为它们几乎有着相同的DNA。我们说汉学与中国文化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但是，这是两个瓜，一个是“西瓜”，一个是“冬瓜”。中国有一句古话：“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还有一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是中国人历来对待学问的精神——取外来文化之精华，以完善自己的文化。汉学家由于自身文化根柢和视阈的影响，所站位置不同，有时也会道破中国文化之谜——这是“汉学”值得中国文化借鉴之处；比如，法国的马伯乐，称道教是“世界上最奇妙的宗教之一”，他独立探索道教的历史及其道术的内部体系，是唯一通晓道教的汉学家；其著作《老子和庄子及圣人的生的神秘体验》《关于道教的考察》《关于中国宗教和历史的遗稿》第二卷《道教》等，都深深影响了中国宗教学者对道教的理解与研究。瑞典汉学家高本汉一生有汉学著作百余种，其中代表作之一《中国音韵学研究》，是构拟古代汉语语音系统的奠基之作，是中国现代音韵学史的开端，他被称为中国历史音韵学研究的先驱。赵元任受其启发，创设中国第一套罗马拼音字母方案；王力说，中国语言学家受高本汉影响很大，不仅接受了他研究的总原则，甚至完全接受他的观点和方法。同样，因为“汉学”含有中国文化的“精华”，对外国文化也具有启迪作用。

汉学也像外国的本土文化，对我们有借鉴作用，对西方有启迪作用——西方学者以汉学为媒介了解中国，汲取中国文化的精华，完善自己的文明——十七八世纪欧洲的“中国热”可见一斑。在文化面前，不能说谁比谁高明，但“差异”总是有的。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和文化语境的差异、思维方向和方式的不同，因而对于文化的看法，就会有不同的结论，说出不同的真理。

人类就像一只巨大的雄鹰，一只翅膀，很难飞翔。人类要想进步，就需要多种文化兼容并包，取彼之长，补己之短，最后达至“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境界！世界只有这样，才会没有战争，各个民族亲如一家！虽然我们怀有这个文化自信，善良的人们也从未放弃这一美好的理想，但实际上，人们追求的天下太平，比登天还难。我们这些学术研究者，文化人，就是这一善良人群中坚，联系中外学者的Sinology，虽属于学术，但也负有这样的使命。

参考文献

- 李兴华. 2021. 论西班牙早期汉学的多源共生性，汉学研究，秋冬卷. 北京：学苑出版社。
高原. 2021. 儒家典籍在欧洲首次译介考辨，历史研究，1: 207-218.